

教科书使用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

李金云, 王嘉毅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近二十多年来, 国内外对教科书使用, 尤其是教师如何使用教科书的研究热点主要聚焦于: 建构教科书使用的不同框架、考察教科书使用的现状与问题、探寻教科书使用的影响因素、探索教科书使用的方式与路径等。未来有关教科书使用的研究大致呈现以下趋势: 研究取向上, 立足教科书使用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矛盾, 深化教科书使用的理论反思; 研究内容上, 从实体思维转向复杂的关系思维, 更加注重教科书使用的事实、规律、价值、规范等研究的整体关照; 研究方法上, 在多维视角的融合中, 综合运用混合研究方法。

关键词:教科书使用; 研究热点;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15)12-0029-08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教科书的使用问题逐渐受到学界关注。本文对国内外教科书使用研究中的热点、难点进行梳理, 分析问题, 总结经验, 对我国未来教科书使用研究予以展望。

一、教科书使用研究的热点

(一) 从阐释教科书使用的概念视角, 提出分析教科书使用的不同框架

研究者从多维视域出发, 对教科书使用的整体过程、使用要素以及转换机制等进行分析, 揭示了对教科书使用的理解。孔凡哲着眼于教科书使用的过程要素, 从理解、研究教科书, 诠释、整合教科书, 运用教科书以及评判教科书等方面

构建分析框架。^[1]并据此创建了“教师使用教科书水平模型”, 该模型将“教师使用教科书水平”划分为五个级别: 误用、机械使用、常规使用、有些新意、创造性使用。^[2]张莉, 芦咏莉将“教师使用教科书水平”描述为“教师教材加工能力”, 指“教师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和自身经验,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及时洞察学生的特点, 运用不同形式的思维, 对教材的内容进行分析、概括、生成与反思的能力”。教师教材加工能力的发展经历了从机械加工到常规加工, 再到精细加工, 直到创造加工的过程。^[3]“教师教材加工能力”的划分和“教师使用教科书水平”等级划分不谋而合, 但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沈健美依

基金项目: 201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 (14XJC880004); 2014 年度甘肃省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甘肃农村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使用问题与对策研究”; 2014 年度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 (2014B-023); 2014 兰州市社科规划项目 (14-057F); 2014 年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 (SKGG14007)

收稿日期: 2015-08-30

作者简介: 李金云, 女, 甘肃天水人,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教育学博士, 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学论研究; 王嘉毅, 男, 宁夏青铜峡人,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据课程实施的层次理论,分析教师如何基于课程标准和学生需要,探索“教材二次开发”中文本转换的层次。^[4]毕华林借鉴活动理论,构建教科书使用“四面体模型”:模型中教科书是教学的工具中介,这一中介的使用受到教师的调节,教师和学生是教科书使用的两个主体,而客体则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教科书、教师、学生、知识四者共同构成了矛盾的统一体。模型展现了教科书使用中教科书、教师、学生、知识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突出强调了教科书使用活动的客体不仅仅是教科书及其呈现的信息,而是更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教科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教学资源 and 工具来发挥作用。对教科书使用的分析体现于四对关系:学生—教师—教科书;教师—教科书—知识;学生—教科书—知识;学生—教师—知识。^[5]

(二)从考察教科书使用的现实视角,呈现教科书使用的现状与问题

探析教师使用教科书的方式。Freeman & Porter从教学内容选择的视角,研究教科书决定初级中学数学教学内容的三种情形,分别是照本宣科、依据学生特征有选择地使用教科书、配合学区目标有选择地使用教科书。^[6]Kon从课程决定视角分析了教科书资源使用情况:有的教师将教科书视为主要的教学资源;有的将教科书视为重要的参考资料;还有的将教科书视为有限的参考资料。^[7]黄政杰列举出教科书误用的八种形态:孤立型、奉若圣经型、照本宣科型、食谱型、画重点型、忽视型、囫圇吞枣型、赶进度型。^[8]陈嘉鸿对高中英语教师的教科书使用情形调查发现:除一套主要的教科书外,教师多同时采用补充教材,包括另一版本的教科书、广播杂志、参考书以及文法书;教师多认为英文教材的最佳来源是教科书。^[9]黄良微对英语教师的调查发现:97%的教师按照教科书内容授课,其中58.5%的教师几乎完全(80%~100%)按教科书内容授课,38.5%的教师非常依赖(60%~79%)教科书内容。^[10]总体来看,教科书使用方式的归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分三类使用教科书的取向;另一种是分两类使用教科书的取向。分三类的取向包括:按照教科书施教;主要按教科书施教,但加入其他教学材料;主要按自行编制的教学材料,以教科书为辅。这三类取向的划分,与

钟启泉、崔允漷归纳的教师使用教科书的三种模式相契合,即“教教材”“用教材教”“不使用教材”。^[11]

了解教师使用教科书授课的比例。Reints & Lagerweij分析了教科书使用的不同比例:11%的教师按教科书逐页教学;50%的教师按教科书的内容结构教学,同时运用其他教学资源;10%的教师视教科书为一种教学资源,与其他教学资源同等重要;20%的教师结合第二及第三种取向使用教科书;10%的教师完全不使用教科书。^[12]陈明耀对台北小学体育教科书使用情况调查发现:教师经常使用教科书教学占47.5%;教师不曾让学生预习教科书占71.7%;不曾对学生测验教科书内容达56.1%;经常使用教科书做教学准备占73.5%;回答小学生使用体育教科书需要程度时,超过六成教师认为“可有可无”或“不需要”。^[13]

分析教师使用教科书的时机。吴莉蓉研究发现:教师使用教科书的时机最多是“课前教学使用”;使用教科书内容授课最多是使用“60%~79%”;教师使用教师手册的频率最多是“经常”;最常使用时机以“课前教学准备”为最多;最常使用内容以“参考资料”为最多。^[14]黄千玘调查发现,教师使用教科书主要因为“出版社提供辅助教学资源”;教科书与教师手册使用频率以“有时”使用为最多;多数教师在决定教学范围时会自行设计课程,并会弹性调整教学节数及课次顺序。^[15]

调查不同学科的教科书使用差异。Crossman与Stodolsky的研究发现,数学、外语、科学、英文、社会等学科的教师对教学及教科书的应用略有不同,整体而言,数学教师最遵守课程要求及教科书内容,他们主要依照知识的序列使用教科书。^[16]研究者也分别就不同学科作了探讨。例如,教师在使用社会科教科书教学时,主要依据课本,也参考教师手册。教学范围完全依据课本内容,偶尔会补充阅读资料;教学顺序则按照课本呈现的课次(主题),教学时间则按教师经验而定,并未依照教师手册;教师使用社会科教科书教学时,主要凭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经验,以讲述、问答和讨论等活动为主,偶尔为学生提供搜集资料、口头报告的机会。^[17]在综合活动教科书

的使用方面,教师使用教科书时机以“课前教学准备用”比例最高;使用方式以“选择并调整教科书内容”最多;使用比例以“有时(40%~59%)”最多;教师使用教科书最主要的原因“节省自编课程的时间”“有助于统整课程实施”“符合课程纲要的课程目标”等。^[18]在音乐教科书的使用中教师使用教学目标比率平均为86%;使用音乐教科书内容的比率平均约为89%,显示教科书在音乐课中的重要性。^[19]

(三)从分析教科书使用的归因视角,探寻教科书使用的影响因素

研究表明,教师教学使用教科书受众多因素影响。诸如,教学时间、考试、学生程度、法令规定、教学信念、家长或社会压力、学生成绩表现、学校设备、不同学科内容、教师同济次级文化、男女性别与学生年级等。^[20]教师信念、教科书和环境因素等三方面与教科书使用情形关系显著。^[21]研究者提出,影响教师教科书使用行为的因素以“教师因素”最具影响力,其次为“学生因素”,而“教科书因素”“情境因素”较不具有影响力。^[22]

研究者将教科书观视为决定和影响教科书使用的主要因素,对教科书观的内涵、要素以及依存于不同教科书观的使用取向进行分析。从教科书建设者视角来看,教科书观即对教科书本质、属性及作用的认识;^[23]从教学关系视角来看,教科书观还包括对教科书的价值、作用、评价标准和处置方式的基本看法。Alverman提出,教科书角色深深地影响着教师的教学决定与教材内容的选择,依据不同的教科书认知,存在三种教科书的使用方式,即依据教科书内容有系统地使用;将教科书作为信息的来源之一,延伸使用;将教科书作为师生讨论时的参考书。^[24]郭晓明认为,不同的教科书观将引导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构建不同的教学生活和学生的学习生活。当今中国教师的教材观以“圣经式”为主流,这种教材观作为教育的社会控制职能和制度化教育强化的结果,它不仅限制了教师教学的个性化和创造性,束缚了学生的学习空间和创造意识,而且割裂了课程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针对这样的弊端,应倡导“材料式”教材观。^[25]这与杨启亮提出知识观和智慧观的教材观有相同之处。“知识观的

教材观”指出教材以本身呈现的知识为目的,教学即以教材所负载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掌握为宗旨;“智慧观的教材观”认为教材是教学使用的材料,通过它去实现智慧的或发展的目的。^[26]陈伯华曾整理教师的教科书观,以说明教师具有不同观念会衍生不同使用教科书的模式。若教师认为教科书即教学内容,其运用模式会倾向于照本宣科;若教师认为使用教科书是提供学习机会,帮助学生思考和建构知识,则运用模式会倾向重视探究和学生自主。俞红珍认为在实践中,教师对如何选用教材通常存在三种观点:即教教材、用教材教、不用教材教。这三种观点反映了课程实施过程中三种不同的取向,即忠实取向、调适取向和创生取向。^[27]伴随教育观和教学观的发展,教科书的使用观开始从“教教材”向“用教材教”转变。

研究者认为不同的教师角色选择,也会影响教科书的使用取向。Ben-Peretz将教师处理课程材料时的角色分为三种:(1)教师是传递课程内概念的人:教科书是课程设计者传递课程概念的工具,是防范教师(teacher-proof)教学偏离课程的材料,教师的角色只是照本宣科,教师能否合法地调试,备受争议;(2)教师是课程实施的主动者:教师在使用教科书的过程中具有影响力,课程设计者应采用工作坊和培训把教科书中的精神传给教师,然后让他们发挥;(3)教师是课程设计者的伙伴:选择和转化教材于特定的教学情境,并没有一套预设的特定教科书,教师根据教育目的因时制宜地阐释和调试教科书。^[28]Parker&McDaniel将此区分为两种情形:教师为课程引导者——将教科书内容忠实地传递给学生;教师为课程代理人——选择或调整教科书内容。^[29]黄显华、霍炳坤根据教师专业角色,把教师使用教科书的模式归纳为两类,一类是专业型教师:他们由课程设计中选择适当的概念和技巧,利用教科书和学生一起探讨,为学生提供学习经验,他们虽然不是学科专家,但以专业知识调试教科书的材料;另一类是依赖性教师:他们不重视学生的兴趣、疑问和困难,他们最关心学生完成教科书的难度,只以学生能记忆课本的内容作为评估学生成绩的方法,很少评估他们能否理解概念以及这些概念和其他学习范畴(包括学

生生活面对的问题)的关系。在教学的过程中,他们只关心教科书中一页、一章、一册的安排。^[30]

研究者认为,教学风格也是影响教科书使用的重要因素。叶芳慈(2009)提出,在教学风格与教科书使用的关系上,偏向教师中心取向的教师关注与考试相关的教科书内容,教师常以“加法”来处理教科书内容,教学时常巨细无遗地解说教科书内容;偏向学生中心取向的教师以学生需求作为筛选教科书内容的主要考量,常以“减法”来处理教科书内容,教师经常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及师生角色互换等方式解说教科书内容。

研究者还对教科书使用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例如,教师使用社会教科书的影响因素包括教学进度和内容、学生能力和教学经验三项。教师使用教科书时,会依进度教授单元的内容、考虑学生程度,并因应学生能力与经验而补充阅读资料;考虑个人教学经验以决定课题教学实践的多寡。在影响艺术教师使用教科书的因素中,以“学生因素”为主,且男性教师受到“学生因素”影响较女性教师高。教师使用数学教科书时会受教师知识和信念、个人兴趣和习惯、对教科书的看法等个人因素,以及学生、时间、学校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小学数学教师教科书解读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课标理解、教科书观、解读理念、解读基础、解读环境、解读态度等方面。^[31]影响化学教师使用教科书的五个核心因素是教师、教科书、学生、课程资源、教学管理制度。^[32]

(四)从优化教科书使用的模式视角,探索教科书使用的方式与路径

研究者从不同视角,梳理教科书使用的基本模式。Chall概括出三种类型:直接学习的取向、着重教科书研读技巧的取向以及使用多元资料(含教科书)的取向。^[33]Remillard & Bryans将教师使用教科书的模式也分为三类:(1)依赖(thorough piloting):非常依赖教科书,倾向使用课程指引,按其中的建议进行教学;(2)采用与调试(adopting and adapting):经常采用教科书或课程指引里的题目,但会改编教科书的步骤和自定教学计划的教学时间;(3)断续与有限(intermittent and narrow):很少使用教科书,教学多运用过去的教学经验和课程资源,偏向选

择较熟悉的题目或曾经使用过的教学活动。^[34]Michael W. Apple按照人们在阅读教科书时潜在反应的不同,提出了教科书使用的三种不同取向:受支配取向、协商取向和对抗取向。^[35]这与Nicol & Crespo列举的依赖型、精巧型和创造型,王世伟总结的“依耐性”“调适型”和“灵活性”相一致。^[36]黄靖加具体探析了这三种模式中,不同类型语文教师教科书使用的具体情形:教师使用教科书同时具忠实观、调试观、缔造观三种方式,整体而言,以忠实观最为明显;教龄21年以上较未满21年的教师更能以调试取向及缔造取向使用教科书;学士后教育学毕业生较教育学系学生毕业生更忠实使用教科书;低年级教师较中、高年级者更忠实使用,比较高年级者更调试地使用;语文领域教师较非语文领域者更能调试及创造性地使用。^[37]从教科书使用流程来看,Sherin & Drake提出阅读、评判、调试是教师通常使用的方式。^[38]

研究者基于多元视角,从不同层面提出教科书使用的优化方略。宏观层面,研究者聚焦教科书的分析和审理,对教科书主体和对课程标准的依据进行分析。研究主要包括对课程标准等上位材料关于教科书所涉及的课程内容与课程要求的熟悉程度及评判水平,以及对教科书的内容、结构、特色等的熟悉程度^[39],强调从教师自身角度考察课程标准等上位材料如何切实指导教学,^[40]应对课程标准和教科书中蕴含的目标、内容、实施和评价要素进行层次上的分析^[41]。这些研究力求从教师的角度和实践的视角,建立起课程标准和教师教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联系。还有研究者提出教的“教材”转化成儿童学的“学材”,紧密联系学生的知识经验选择具体教学内容,基于“学情分析”转化教材内容。^[42]还有研究纵向剖析教师解读教科书的层次,并针对每一层次提出相应关注点,如第一层关注教科书包含了什么;第二层思考教科书的重点是什么,难点何在;第三层关注教科书内容应该如何组织与整合;第四层关注如何看待教科书的地位和作用,教科书对教师和学生意味着什么,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分别提出了什么要求;第五层思考教科书蕴含着什么,折射出什么样的学科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43]或将教科书多元地视为蓝本、母

本、学本、范本等，强调教科书使用的教学规划，资源开发，主动探究，举一反三等。^[44]中观层面，研究内容遵从实体思维，重点探究教科书文本价值的开发^[45]、分析教科书练习使用策略、^[46]插图等的使用。^[47]还有研究者从教科书的某一系统出发，如着眼于语文教科书选文系统“定篇、例文、样本、用件”等功能的使用策略。^[48]周坤亮基于儿童经验的视角，探讨了教师如何用教材教的问题。认为教师应从三个方面予以考虑：一是学生当下经验中有哪些可利用的因素与教材有关；二是怎样利用这些因素；三是怎样用教师的教材知识帮助解释学生的需要和行动，指导学生成长。^[49]微观层面，以具体学习主题、课文为例，对教学内容的拓展与整合、教学策略的选择与优化提出策略，如“增、删、调、并”^[50]；“重组、延伸、提升与整合”等。^[51]

还有研究者从教科书自身角度提出相应的策略，提出教科书应着眼于不同地区差异，通过自身的改进，帮助教师改变观念，创造性地使用教材，^[52]或通过教科书进行教学内容选择与定位的优化方略，实现“课程内容的教材化、教材内容的教学化”。还应明确教科书“课本”的功能，“课程研制”的责任，“呈现方式”的教学价值以及教科书“供选择”的商品属性。^[53]

二、教科书使用研究的反思

(一) 需要研究教科书使用的取向与定位，建构教科书使用的分析框架，研制相关的分析维度和指标体系

根据不同的定位取向，教科书的使用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这种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研究视野，但也导致研究者对教科书使用的具体内容、呈现形式认识不清。建构一个清晰的教科书使用的分析框架，研制完备的具体维度和指标体系，既能弥补当前认识论上的缺憾，也能促进当前有关教科书使用研究的理论发展。

(二) 需要研究教科书使用的理论与知识，深入考察不同学科教科书使用的主要影响因素，揭示教科书使用的主要问题

教师对教科书的使用受到诸多外在和内在因素的影响，教学目标的设定，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资源的开发，教学方式的设计等，均是教师

对教科书的理解、诠释、整合、评判以及研究等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从目前教科书使用的研究内容来看，教科书使用与相关因素的探讨还不够丰富和深入。比如，教科书使用与教师专业发展的相互关联、教科书使用与教师实践知识的相互影响、教科书使用与教师教学决定的关系等，均缺乏对教科书使用内部过程的探讨，未把教科书使用这一问题放在整个教学进程中，探讨它和更大属性之间的关系。因此，全面了解教师教科书使用的基本现状，深入考察不同学科、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师教科书使用中的影响因素，丰富教科书使用研究的理论与知识，深入揭示教师教科书使用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现有的研究多是针对“为教而教”的教科书使用情形的探讨，如何从学生学习的终极目标着眼，适合信息时代以“学习导向”为特征学与教的变革，转向“为学而教”来研究教科书的使用，定会有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和丰富的研究成果。

(三) 需要研究教科书使用的过程与结构，探寻教师专业发展对教科书使用的实际影响，为提升教师教科书素养、教师培养培训针对性以及学科教学能力标准的科学研制等提供建议

将教科书使用视为动态、生成的过程，需要整体研究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使用教科书的脉络，解析教科书使用的结构，分析不同阶段教科书使用的具体问题与现实困难。研究者需要走入教学田野，深描教师专业发展对教科书使用的实际影响，并将优化教科书使用作为教师专业成长的标尺，为教师培养和培训机构制订教师培养方案提供本土的理论借鉴和方法指引，为各学科教学能力标准的研制提供建议。

(四) 需要研究教科书使用的方法与技术，分析教科书使用的经验和误区，为教科书编制的优化提供现实指导

反思教科书使用的研究，需要将研究致力于教师在教学中对教科书进行有意义的教学转化，并从重构教科书观的视角，探讨教科书使用的理念与要求，优化教科书使用的方法与技术。同时，课程设计者也要发挥专业的角色，致力于教科书自身的完善，使得由上至下的各层级转化得以更好地实现。因此，充分了解教师教科书解读的方式，研究教师教科书使用的经验与问题，探

索如何在正确把握教科书特点的基础上, 选用更好的内容和形式, 提升教科书对师生的适切性与发展性, 优化教科书质量, 改善学生学习, 也是一个重要课题。

三、教科书使用研究的趋势

(一) 研究取向: 立足教科书使用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矛盾, 深化教科书使用的理论反思

目前研究者主要通过理论思辨和经验梳理对教科书的使用进行分析描述, 阐发教科书的微观使用策略, 但这种研究取向缺乏深入的学理探寻和研究的整体关照, 无法揭示教科书使用与专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也不能考察教师是如何使用教科书以及对学生学习产生的实际影响。对于教科书使用的内在特质和影响因素, 对于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升教科书编制的适切性以及教师培养培训的新要求等, 还未能深入探析。教师、学生、教科书是教学过程的主要因素, 如何按照教学论基本原理审视、理解、评析和使用教科书, 揭示教科书使用的基本矛盾, 提出教科书使用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是今后教科书使用研究的立足点。围绕“教师教学与教科书”“学生学习与教科书”“教师和学生的关系”等维度, 在深化教科书使用现实检视的基础上, 融入教科书使用的理论反思, 进一步改进“教师使用教科书”问题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从整体优化的角度, 围绕教学系统的不同维度与层面探讨教科书使用与教学和学习之间的互动和转化, 以切合学生学习的需要, 将是未来研究的取向。

(二) 研究内容: 从实体思维转向复杂的关系思维, 更加注重教科书使用的事实、规律、价值、规范等研究的整体关照

当前国内的研究更多关注教师对教科书所采取的一些具体操作行为, 例如, 对教科书的内容进行增加、替换、重组, 这种研究能够起到一定示范作用。未来教科书使用研究将不拘泥于研究教科书本体, 在研究内容上将更加注重教科书与教学中其他因素的内在联系, 更加注重现实教学情境中动态的教科书使用过程、影响因素及其对教学主体的反作用。已有的教科书分析研究已无法满足这一要求, 未来的研究倾向于针对教师如何认识和使用教科书, 教师专业发展如何影响教

科书的使用等问题的实证研究方向发展。正如蓝顺德强调的: “高质量的教科书是提升学校教学水平的必要条件, 但不是充足条件, 教师的素质是决定学校教育质量的另一个关键, 唯有促进教师专业知能不断成长, 方能真正有效使用教科书。”^[54] 因此, 未来的研究将着力探讨教师的教科书素养, 在优质的教科书基础之上, 关注教师专业在教科书转化的重要内容。在探索教科书使用应该如何优化的同时, 更为注重研究的学理性与整体性, 对教科书使用“本来怎样”“应该怎样”“本应怎样”的事实、规律、规范、价值等问题做整体关照, 特别是着重分析不同学科、不同学科内容、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师的教科书使用与教师专业发展、学生素养的互动关系, 展现其“应然”和“实然”状态。

(三) 研究方法: 在多维视角的融合中, 综合运用多样的方法

目前研究者基本采用单一视角(或教学论、或课程论、或教材学), 单一研究方法(或文献梳理、或调查分析、或理论思辨)来探究教科书的使用, 具有一定的特色。但是, 教科书的使用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单一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无法全面揭示教科书使用的事实、规律与规范。因此, 采用多维的研究视角和多样的研究方法, 在今后可能更加普遍。今后的研究需要在以定量的结构性分析为线索的基础上, 联合质的研究提供情境细节和意义阐释, 建立数据分析和意义理解的关联。特别是在静态分析教科书使用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更多融入教学现场的实际观察, 动静结合地揭示教科书使用的取向、内容、方式和影响。未来教科书研究也要加强科际整合, 从各领域汲取新的研究方法, 借鉴新的工具, 通过多种研究方法的互补、融合与整合, 更好地揭示教科书使用的事实规律, 夯实教科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参考文献:

- [1] 孔凡哲. 教科书质量研究方法的探索——以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为例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147.
- [2] 孔凡哲, 史宁中. 教师使用教科书的过程分析与水平测定 [J]. 上海教育科研, 2008 (3): 4-9.
- [3] 张莉, 芦咏莉. 论教师的教材加工能力 [J]. 北京

- 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1): 58-64.
- [4] 沈健美. 教师基于课程标准和学生需要的“教材二次开发”[J]. 课程·教材·教法, 2012(9).
- [5] 毕华林、万延岚. 课堂教学中教科书使用模型的构建与应用[J]. 当代教育科学, 2013(12).
- [6] Freeman D J, Porter A C. Do Textbooks Dictate the Content of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s? [J].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1988, 26(3), 403-421.
- [7] Kon J H. The Thud at the Classroom Door: Teachers Curriculum Decision-making in Response to a new Textbook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1993.
- [8] 黄政杰. 多元社会课程取向[M]. 台北: 师大书苑, 1995. 88.
- [9] 陈嘉鸿. 南台湾高中英文教师对高中新英文教材之意见及使用现况之研究[D]. 高雄师范大学, 1999.
- [10] 黄良微. 南台湾高职英文教师对英文教科书的看法及使用现况[D]. 高雄师范大学, 2003.
- [11] 钟启泉, 崔允漷. 新课程的理念与创新[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 [12] Reints A, Lagerweij N. On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Materials [M]. Tiburg; Zwijisen. 1989.
- [13] 陈明耀. 台北市小学体育科教科书使用现况[J]. 国民体育季刊, 2000, 29(3): 34-41.
- [14] 吴莉蓉. 台中市小学艺术与人文教师对艺术与人文教科书之使用现况与意见调查研究[D]. 新竹教育大学, 2004.
- [15] 黄千玳. 国民中学表演艺术教师教科书使用情况与意见调查研究[D]. 台北艺术大学, 2008.
- [16] 霍秉坤. 教科书使用取向的核心: 教师专业发展[A]. 教科书评论 2014 [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5.
- [17] 洪若烈. 国小教师之教科书使用方式及其影响因素之探讨[J]. 国教学报, 2003, 15: 175-192.
- [18] 管晓真. 桃园县国中综合活动学习领域教师教科书使用行为之研究[D]. 台湾师范大学, 2009.
- [19] 陈雅美. 台北市国民小学音乐教师教科书使用之研究[D]. 台北市立教育大学, 2012.
- [20] 刘昭宏. 教科书在国中理化教学中的应用之个案研究[D]. 彰化师范大学, 1993.
- [21] 潘业丰. 屏东县国中数学教师教科书使用情形之探讨[D]. 屏东教育大学, 2009.
- [22] 管晓真. 桃园县国中综合活动学习领域教师教科书使用行为之研究[D]. 台湾师范大学, 2011.
- [23] 曾天山. 教材论[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7: 69.
- [24] Alverman, D. E. Teacher-student Mediation of Content Area Texts [J]. Theory into Practice, 1989, 28(2): 142-147.
- [25] 郭晓明. 从“圣经”到“材料”——论教师教材观的转变[J].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2001(6): 17-21.
- [26] 杨启亮. 教材的功能: 一种超越知识观的解释[J]. 课程·教材·教法, 2002(12): 10-13.
- [27] 俞红珍. 教材选用取向与不同的教材观[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5(16): 42-44.
- [28] Ben-Peretz, Miriam. The Teacher-Curriculum Encounter: Freeing Teachers from the Tyranny of Texts [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 [29] Parker W C, McDaniel J C. Bricolage: Teachers Do it Daily. In E. W. Ross. Teacher Personal Theorizing: Connecting Curriculum Practice, Theory, and Research [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97-114.
- [30] 黄显华, 霍炳坤. 寻找课程论和教科书设计的理论基础[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 191.
- [31] 沈林. 小学数学教师教科书解读的影响因素及调控策略研究: 以西师版小学数学教科书为例[D]. 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1.
- [32] 毕华林. 化学教学中教师使用教科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J]. 化学教育, 2013(10): 47-51.
- [33] Chall J S, Conard S S. Should Textbooks Challenge Students? The Case for Easier or Harder Textbooks [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1991.
- [34] Remillard J T, Bryans M B. Teachers'orientation toward Mathematics Curriculum Materials; Implications for Teacher Learning [J].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2004, 35(5): 352-388.
- [35] M阿普尔. 教科书政治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36] 王世伟. 小学教师使用教科书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香港中文大学, 2008.
- [37] 黄靖加. 台北县小学级任教师国语教科书定位与使用之研究[D]. 台北市立教育大学, 2009.
- [38] Sherin M G, Drake C. Curriculum Strategy Framework: Investigating Patterns in Teachers' use of a Reform-based Elementary Mathematics Curriculum [J]. Curriculum Studies, 2009, 41(4): 467-500.

- [39] 孔凡哲. 教科书质量研究方法的探索——以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为例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 [40] 崔允漷. 课程实施的新取向: 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 [J]. 教育研究, 2009 (1): 74-79.
- [41] 胡定荣. 教材分析: 要素、关系和组织原理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3 (2): 17-22.
- [42] 钟启泉. “优化教材”——教师专业成长的标尺 [J]. 上海教育科研, 2008 (1): 7-9.
- [43] 王世伟. 教师使用教科书的原则: 基于教学关系的思考 [J]. 课程·教材·教法, 2008 (5): 13-17.
- [44] 颜禾. 对教科书使用问题的回顾与思考 [J]. 教育评论, 2014 (2): 141-145.
- [45] 郑桂华. 语文教师解读课文的基本路径 [J]. 中学教学参考, 2012 (7): 4-6.
- [46] 黄厚江. 教科书练习的基本类型及其在教学中的使用 [J]. 语文建设, 2008 (6): 14-17; 谢云燕. 补白·删减·整合·创生: 课后练习的“二次开发” [J]. 课程教育研究, 2012 (35): 48.
- [47] 吴建平. 激活思品教材插图催生有效课堂教学 [J]. 教学月刊 (中学版), 2011 (9): 15-16.
- [48] 王荣生. 语文学科课程论基础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315.
- [49] 周坤亮. 教师如何用教材教学: 基于儿童经验的视角 [J]. 当代教育科学, 2010 (10): 13-15.
- [50] 方武. 语文教材的探究与运用策略 [J]. 中国教育学会, 1996 (6): 6-9.
- [51] 林茂平. 语文教材的创造性使用——谈教材的重组、延伸、提升与整合 [J]. 语文建设, 2003 (4).
- [52] 付宜红. 兼顾城乡差异中教师与教科书的责任 [J]. 基础教育课程, 2005 (10).
- [53] 王荣生. 对语文教科书评价的几点建议——兼谈语文教科书的功用 [J]. 中国教育学会, 2007 (11).
- [54] 蓝顺德. 台湾教科书编审历程与出版 [C] // 首都师范大学. 2014 “教科书研究高峰论坛”论文集.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72.

(责任编辑: 刘启迪)

Research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Use of Textbooks

Li Jinyun, Wang Jiayi

(College of Edu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hotspots about how to use textbooks, especially how teacher use textbooks at home and abroad mainly focused on following aspect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establishing different frameworks for the use of textbooks, investigat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use of textbooks, exploring the influencing elements in the use of textbooks and probing into the approaches for the use of textbooks. Reflected over the present researches about the use of textbooks, we need to further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cognition and overall thinking upon their different values and categories, conform to disciplines and requirements of different thinking type and further discuss the core issues such as direction and orientation, theory and knowledge, process and structure, and method and technique of the use of textbooks.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 about the use of textbooks will be as follows;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 will base on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contradiction of the use of textbooks and intensify reflection about its theory; the research content will change from concrete thinking mode to complex relationship thinking mode and more attention will be paid to integrated concerns about research's fact, discipline, value of the use of textbooks, etc; mixed research methods will be comprehensively employed in the multi-dimension integration.

Key words: the use of textbooks; research hotspots; development trend